

父亲的钟表

●陶树理

我的父亲陶通在世时，世人常称“陶万能”，因他有多方面的爱好。其经常兴致盎然地摆弄几种机械类钟表更是他一生的嗜好。

1956年，父亲被上级从朔县师范教导主任的岗位上调到北关中学，参加了朔县一中的筹建工作。期间，他屡次去设在大同市的雁北专署开会或出差。有一次，他拿出一个用两层报纸包装的方正严实的东西，我好奇地打开后，露出一个见方约16公分，厚度约4公分，中间有序叠加着好多齿轮扣齿轮的黄色物件。母亲在娘家见过这样的小机器，因而不太喜欢地说：“连个表罩也没有，买这种东西做啥哩！”父亲却很自信地说：“这是我花五元钱从大同百货市场买的旧座钟，很便宜啊！我有空会把它装配好的。”随后，重新包装起来，搁置于他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因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此事。

1957年秋，我在北完小读小学。习惯于下午放学后去父亲的办公室或玩，或读一些父亲给我准备的小学生读物。有一次看到办公桌的左端多放了一台装满整齐书籍的浅绿色书架，书架上方的窗台正中央摆放着一台“嘀哒、嘀哒……”作响且有回音的座钟。我喜出望外地注视这台父亲亲手装配的座钟。座钟的外罩是一个浅绿色的长方体木盒，高约33公分，长约23公分，宽约10公分。紧贴木盒顶部的前边缘处，用胶水粘立着一块三合板做的浅绿色的正三角形，其中央镶嵌着一枚红彤彤的小五角星，木盒前面上装有一扇浅绿色框架的玻璃门。座钟的表盘是用白色的硬纸板做成的。表盘轴上安装的秒针涂成红色，时针和分针涂成黑色，都是用薄铁皮剪出来的。1—12点的数字是用毛笔写到表盘周围上的黑色字体。就在表罩内部前右下角处，站立着一位高约8公分的陶瓷老寿星，右臂微微抬起，一根细米丝把其右手和管打钟的某个齿轮紧紧连在一起，每到打点时，老寿星的身体就在齿轮的带动下转半个圆。从1点到12点可转动12次，每半点也转一次。老寿星身穿红白相间的长袍，银须飘然，神采奕奕，栩栩如生，酷似后来电视剧《西游记》中走出来的神仙“太白金星”。这也是父亲仅用几毛钱从大同古玩店中挑选出来的装饰品。有这种配件的钟表，看似简单，但在当时县城的钟表行里却绝无仅有，可谓独出心裁之作。从此，父亲这间大约

20平方米的办公室，在新书架、座钟及座钟两侧对称放置的两盆红玫瑰的映衬下，格外温馨雅致。凡来过办公室的师生或客人，都以钦羨的目光观看着老寿星的转动，聆听着清脆的钟声。

也许座钟的诞生迎来了父亲的好运，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早在1937年7月，父亲就考入清华大学机电系，后因卢沟桥事变，避难于北平的“山西会馆”。1938年7月离京返乡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参与组织了八路军西山抗日根据地“战前动员会”。1946年6月，曾秘密绘制了朔县城内标有街道和守军要害部门的地图，提供给攻城的解放军，为县城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此事文革后期有关领导作过证实）。

后来，每当有人询问这座钟的来历，父亲在笑谈中都会深情地提到为他制作钟罩和书架的挚友“大老张”——当年以精湛的榫卯技艺闻名遐迩的七级木匠张文藻：胖胖的中等身材，四十多岁，络腮胡子，大眼睛，虽稍带“恶相”但头脑睿智，开朗乐观，为人谦和，淡泊豁达。据说雁北专署特意从朔县师范借调他参加了朔县一中的筹建工作，成为建筑设计者和施工者之一。1956—1958年期间，我和几个小学同学常到热火朝天的一中大礼堂建筑工地看热闹。正值盛夏季节，“大老张”头戴白色瓜皮帽，上身穿白色坎肩，赤胸裸臂东奔西跑，汗流浃背，时而查看图纸，时而指点工人干活，嗓音时而洪亮，时而嘶哑，时而絮叨却不烦人，受人尊敬。其独具风格的工匠形象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人生的厄运会随“无奈”而至，而幸运也会随“巧合”光顾。时事变迁中，父亲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兢兢业业工作了九年的朔县一中，回到了原籍业蔡庄的家中。父亲的座钟摆放在母亲多年来使用的一个简陋的旧衣箱上。“嘀哒、嘀哒……”的钟摆声，老寿星的打点声，给这生活在陈旧土窑中的家庭带来了些许苦中有乐的安慰，似乎增强了家人们度过难关向前的信心。

然而回家没几天，父亲又接到了上级的调令，来到了位于朔县城内南街东侧的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担负起各联区教师的培训任务。为了准时授课，父亲不顾家庭经济拮据，买了一块廉价手表，骑着半新的“飞鸽”牌自行车，不畏路途的崎岖坎坷，风雨无阻地履行着培训的任务。

1965年下学期，我在神头中学读高三，多次去进修校看望父亲，曾目睹有音乐天赋的青年教师李万仁弹奏落地大风琴，父亲吹笛子伴奏，奏出《我是一个兵》等革命歌曲，明快悦耳鼓舞人心的旋律，从大办公室飘逸到校外的街巷里。父亲爱好音乐，据朔县师范早期毕业生冀月成先生和他的同学们撰写的《忆恩师》中回忆：父亲在朔县师范建校初期，除了徒步下乡招生，编写教材，独自担起语、数、政、理、化、音、体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外，经校长委托，由他组织了60多名学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深入朔县、山阴、怀仁等地区的城镇乡村，演出了以《白毛女》经典剧目为主，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起到了深受群众欢迎的多种节目，起到了教育人民和鼓舞人民斗志的积极作用。为此，受到了雁北专署的表彰奖励。在演出现场，父亲或者在文场拉胡琴、唱戏；或者在武场拍钹、打板；或者和演员们一起识谱练唱，虽不是十分专业，但都能拿得出手，起到了指挥和协调的作用。故而，师范的师生颂称他为“陶万能”。这个雅号不胫而走，传遍了朔县及周边地区的教育界。父亲曾深情地说：“我在1949年2月调入初建的朔县师范工作的几年，是我平生心情最舒畅、工作最有成效的岁月，师生称我为“陶万能”，虽属过誉，但表达了他们对我的友好和尊重，我感激不尽！”

曾有一段时间，父亲被下放到福善庄公社的西部小学任教。他不因“屈就”于小学教员的岗位而沮丧和悲观，也不因远离西坡的家乡自己烧火做饭而苦闷和烦躁，而是以学校的一台双铃马蹄表和他的手表为标准时间，认真制定了作息时间表和课程表，和本村的一位年青女民办教师带领着1—4年级的四五十名孩子们，一如既往地，有条不紊地进行教学并开展了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多样活动：踢毽子、跳绳、滚铁环、捉迷藏以及在父亲笛声伴奏下的童声小合唱……村民们说：“学校又红火起来了！”

岁月荏苒，1973年，父亲调到了神头中学任教。接着担任校办“名牌工厂”的采购，负责在雁北地区推销产品和采购原料的工作。凡他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他曾经的学生们的热情款待，工作进展很顺利。父亲曾开心地说：“我又一次尝到了当教师的甜头！”父亲的复职也使我大沾其光。同年6月，适逢在一中教书的姐姐要请产假，她向校长推

荐我到学校代课，以补她的缺位，校长看在“陶万能”的面子上，认为“虎父无犬子”，就吸纳了我。从此，我摆脱了近六年的农村重体力劳动成为一名代课教师。父亲为此欣喜地给我买了一块“广州牌”手表，以鼓励我认真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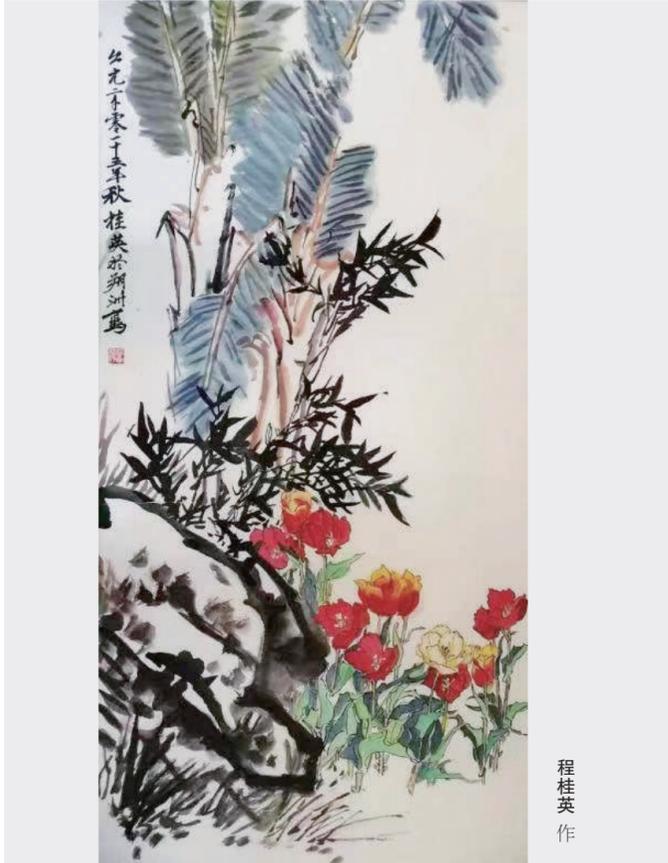
1976年，雁北师专复学，父亲担任了师专的部分领导职务。1978年，父亲利用他补发的工资买了城内北街砖窑巷的一处清末民初时期的旧宅（两间小正房，一间靠大门的小西房）。母亲带着我弟、妹随即从老家搬迁入住。从小在娘家成长而习惯于城街生活的母亲，圆了她定居城内的生活之梦，不禁心花怒放。逢亲友和熟人便自豪地说：“我再不用窜房檐头了！”

当年夏末秋初，父亲又从大同古董店廉价买回一台旧座钟。表罩恰似一个小城门洞的形状，高约40公分，宽约25公分，沿表罩的两边镶嵌着铜质的十二生肖，形象逼真，活灵活现，引人注目。虽在岁月的打磨下失去了它昔日的光泽，可它那光滑的深红色外表仍显古色古香的风韵，尤其那沉稳而洪厚的钟摆声和打点的钟声，给这新入家的家庭平添了许多生气与欢乐，成为父母晚年生活有声有色的伙伴。

1984年10月，父亲离休。这一次他是享有雁北师专于1983年评为“模范党员”的荣誉回家的。至此，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为之奋斗了近40年之久的教育事业，和母亲相濡以沫度过了一段他们平生最舒服最轻松的岁月。其间，不减他经常摆弄钟表或去老干局参加文艺活动的情趣；不失每天听“新闻联播”或隔日和老友读《参考消息》关心时事的心态。

2006年12月14日下午14时25分，父亲与世长辞，走完了他历经沧桑的91年路程。悉闻噩耗，由他的老学生、曾任朔县师范校长的刘汉卿先生主持，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前来悼念的五十多位老学生，全都是年逾花甲而精神矍铄的离退休干部。雁北师专派党委副书记致悼词，对他的一生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从教期间，陶老爰生如子，为了学生，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为了学生，他循循善诱，废寝忘食……同时，他还积极参与政议政，曾当选为朔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朔县第一届第一次委员会委员、朔县第一、二、三、八、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朔县人大常委会委员。”未能到场的学生也打来电话，表示深切悼念。

父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他生前酷爱的钟和表仍在。睹物思人，痛彻心扉。他的音容笑貌常在我们后代眼前浮现，他们对我们后代的谆谆教导仍在耳畔回旋：“人要像钟表那样，永远走对方向。不管能力高低，本事大小，要本本分分的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这句寄希望于后代的叮嘱已成为我们的家训。



程桂英作

拖着

我从中门，她从前门，上公交。虽然身在人群中，在我的感觉中，上车的却好像只有我和她。只因注意到她有一件硕大的行李：铁皮箱。超出印象中的公交范畴。

车开动了，越过人群，看到她和箱子比肩而立。我略略放心：还好，允许上车。携带有潜在危险性的大物，极有可能遭遇拒载。

一阵哗啦作响，她很快有了座位。让座者出于同情及困惑，抑或安全感。人们同时也为箱子让出空间。

箱子薄而空，在行进的车体内不能自控。箱子一跑，她的手便重重拉住，响亮地拽回来。很像盛怒的母亲夸大对孩子的教训。

因为离得近，我的包被活跃的箱子冲撞了两次。只好不让她察觉地悄悄躲开一些。

她是一个悲情的旅客，一路在述说自己的遭遇。她凝聚了人们散乱的注意力。

“做啥啥不顺！”

“什么破箱子，我儿子用都没用就成这样了。”

“我要找110！”

“到110了吗？”

“师傅，到110叫我一声。”……

她听从别人的建议，挤到车厢前边，去向司机交待明白。一个女人自告奋勇，帮她扶住箱子。然后就是久久不见她回来。当刚上车的乘客要坐她的座位时，人们不约而同会说“有人了”。

人头攒动中，终于看到了她——端坐在一个临窗的位子上，望着车外。她好像气糊涂了，想不起还有箱子的事。她在潜意识中很想抛下箱子吧。

看箱子的女人有点急：“哎呀，我得下车了。快来管你的箱子。”人们悄悄地笑。她这才回来了，带着极不情愿的神情……

我到站下车，发现她和箱子也下来了。虽然还没到“110”。

她拖行几欲散架的箱子，与地面摩擦生响，声动传远近。就像拖着人类的全部苦难。有时候她改变方式，用胳膊抱、肚子抗来搬运这个冤家。一个柜门彻底废了，她摔摔打打地塞进柜里，拖着继续前进。

“110”是否还在等待？

“110”管她和箱子吗？

好像开天辟地的时候她就拖着一个箱子了。大而无当，又破又响，完全累赘……她走出了许多怨气。所有路人的怨气都汇集于此。我觉得我的烦恼也在那箱子里。

人来人往。依然一派马路上的风光。明媚的阳光、摇曳的花树渐渐淡去她的身影。只有，只有那个身在课堂的学生，也许会久久走神？

母亲的维权之路远不远？

她回百谷寨

去妈家先步行了一段。这条几乎没有走过的路，印象中很长很长。于是心里就有了一点点激动，以为自己一定走出了可观的步数。事后才发现还不到5000米，也不值得夸耀。

那天因为中考，3路车暂时改变路线。回的时候可以用原来的办法，公交车3、4、1路地倒。

在终点站，她一上车就毫无针对性地问：“这车去不去开元？”车上的人你一言我一语。

我给她总结了一下：“是左环，就去。”我也没有注意这趟车是左环还是右环。

再有人上车了，她自言自语嘟囔一句：“看看是不是左环……”

街遇二则

●雷云霞

车过开元站，我观察到她没什么反应，就没有提醒她。又过了好几站，她突然问我：“开元到了吗？”天呐，她原来不熟悉这条路。

费尽唇舌才说服她下车，到对面站牌坐车返回去，消灭她回到终点站重新乘车的打算。这时候我发现自己也坐过站了。

实在不放心她，我到对面站牌去等4路公交。因为经过刚才的短暂交流，得知她不识字，不问人很难保证下对车。今天的公交车恰恰不报站名。

赤日炎炎的午后，我还担心她上错车，万一被1路公交载了去，她离开元会越来越远，我如何去纠正她的错误路线。4路车很快来了，第一站我上来，第二站她上来。我对她说，我和你去开元吧。

再聊天的时候我暗暗叫苦，开元竟然不是她要去的地方。她说她认得开元，从开元要走到农贸市场口，有一个公厕的地方，再回村里的班车。还说附近是二中。

二中多年以前就被四中合并了。而且它的校址在南面，离农贸市场很远的。我们在路经的第一公厕下车，公厕后面是草木葳蕤的公园。经她确认不对。我和她继续向北走。基于她的脸早已晒得很黑了，我独自撑伞，没替她遮阳。

也就是一站地的路，就到了第二公厕。她说了对，就是这里。附近是二小，她记成了二中。邻近的小广场上有个凉粉摊，摊主热情地招呼她。她说，不行，不能吃凉的。她要去吃碗面。我按按自己饱了的胃，心里就有些惭愧了。

她往小巷里走去，我怀疑里边有没有面馆，以及到底有没有班车。她突然又折回来，我赶紧迎过去。

她说，她住百谷寨，让我去。

烈日下大姐的笑容很温暖，我被评为“好心人”。这个称号要胜过年度先进个人的荣誉。

在那一站地的路上，我知道她58岁，比我大7岁，进城是为了买药。我说慢慢认字吧，出门方便些。她说也上过一两年学，智能手机就是不会用。我说再出来的时候让孩子画个图，拿着图问路。她说不给孩子添麻烦。她和我诉说问路的苦恼，有的人挺热情，有的人根本不理。我安慰她，那是他们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是好容易才明白。

有人舞文弄墨，有人不识字。

锄禾日当午。大姐的脸晒黑了，庄稼晒熟了。

粒粒皆辛苦。唯愿饱食者的文字有了以后，更多人的心灵能够因此而明亮起来。

百谷寨，我喜欢这个村名。也许我听懂了，仍然喜欢。

投稿邮箱：szrfk@126.com

朔县年俗杂忆(四十八)

猜谜语

●陈永胜



心要斗这个“笑面虎”。元宵节晚上，各家各户都挂上了各式各样的花灯，王少又打着个花灯上了街。这只花灯又大灯亮，更为特别的是上面还题了一首四句小诗。王少来到“笑面虎”门前，把花灯挑得高高的，引来很多人围观。此时“笑面虎”正在门前观灯，赶忙挤在花灯前，就摇头晃脑地念起上面的诗来：“尖尖身细白如银，论秤没有半毫分。眼睛长到屁股上，只认衣裳不认人。”“笑面虎”听后暴跳如雷：“好小子，胆敢骂老爷！”王少笑嘻嘻地说：“老爷，咋见得我是骂你呢？”“笑面虎”气哼哼地说：“你那灯上是咋写的？”王少又大声地念了一遍。“笑面虎”恨声说：“这不是骂我是骂谁呢？”王少笑着说：“老爷是犯了猜忌，我这四句诗是个谜语，谜底就是缝衣裳的‘针’，老爷想想是不是啊？”“笑面虎”一想，可不是个“针”吗，转身灰溜溜地走了。这事后来越传越远。第二年元宵节时，不少人将谜语写在花灯上，供人猜射取乐。因此谜语也叫灯谜。

由于灯笼的空间毕竟有限，后来的灯谜也就不拘于灯笼之上了，谜语和灯谜也就变成一回事了。

朔县文化馆元宵节的猜谜活动从正月十四正式开始，到十六结束，整整三天三夜。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先把谜

面依次写在整张整张的红纸上，然后贴在用五合板制成的展板上，摆放在文化馆门前的东西两侧供人猜射。

文化局的猜谜是有奖的。根据谜语的难易程度来定奖品的高低，低的是一支铅笔或一块橡皮，高的常是一个简装的或精装的笔记本。这样一来，文化馆的门前常常是人山人海的热闹。一个谜面众人竞猜，想要得奖比得往往是速度，手迟脚慢是不行的。于是，志在必得的猜谜者或二三人或四五人组成团队，动脑筋的动脑筋，查资料的查资料，跑腿腿的跑腿腿，唯恐步了他人后尘。猜射的人自然重要，跑腿腿的人也不能小看，因为不管有多少人猜出了谜底，得奖的只能是走在最前面的人。

家住东大街马神庙巷的周田野夫妇对猜谜情有独钟，两个人很自然就组成了“夫妻队”。那时他们还年轻，街上的红火也顾不上看，抱着三大册城砖似的《辞海》，坐在文化馆的门前捣鼓。戴着瓶底一样厚的近视镜的胖乎乎的周田野先生，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他进二完小当了老师，后来又调到了工厂。不知是周老师的水平有限，还是他的妻子跑得快，得奖率似乎并不高。然而，他们夫妻二人从来都没有气馁过，而且是愈猜愈精神，猜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文化馆停办了这一活动为止。抱着《辞

海》从家门匆匆奔向文化馆的周老师的形象至今刻在我的脑海里。

那时的文化馆职工少，搞有奖猜谜活动是很劳神费力的。元宵节前就要设专人把谜面用毛笔写在红纸上，并且不能有半点差错，大概一写就是四五十张红纸吧。除了这个写的人，还要有宣读领奖的人，保管和现场发放奖品的人。还有一个比较累的人：如果哪一条谜面被人猜中了，这个人就得马上登上板凳用毛笔把这条谜面抹掉，以提示人此条谜面已被人猜中了。说周田野老师夫妇忙得不得了，这位文化馆的职工似乎比周老师他们还忙，不仅得登高，还得仔细认真，不能把未被猜中的谜面抹掉了。

我三舅是中学的语文老师，肚子里有墨水，正月十五来我家看红火，留宿最多的地方就是文化馆的门前，看人们猜，他也琢磨着猜，也有猜中的时候，可他就是不愿意积极地去报名，奖品自然也就花落他人了。我三舅说，重在参与，何必大新正人和人们去叨抢呢？说的也是，那时，由于“叨抢”的人多，吵起来，甚至是打起来的现象也是有的。虽说是极个别现象，但在是有辱斯文啊。

朔县文化馆是哪一年停办了“元宵节有奖猜谜”活动的，我记不清了。但人山人海的猜谜场景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